

# 日常生活、都市文明与现代科学的传播

——以1900年代的中国现代大众文化为中心

韩 晗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091)

**摘 要** :1900年代,以电影、话剧、画报与科幻小说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大众文化,见证了现代科学的影响。以“私人空间”为核心的都市日常生活,通过现代科学孕育大众文化,并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形态,但由于当时中国并没有建立起理性、公共性的现代社会,导致现代大众文化根本无力承担起文化启蒙的历史责任。

**关键词** :日常生活,都市文明,现代科学,大众文化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91(2015)06-0117-07

DOI:10.16197/j.cnki.lnupse.2015.06.019

1900年代(1900—1909)既是20世纪的前十年,也是中华帝国的最后岁月。在这曙光与余晖并存的十年里,中国的政局波谲云诡,革命替代了改良,成了中国知识界寻求社会改革的破题之术。王德威认为,这一阶段的文化特征乃是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sup>[1]</sup>,即具备时代性、启蒙性的现代性因素已经出现,但未完全展露出来。

但笔者认为,以当下的视野反观1900年代的中国文化,实际上很大程度上由存在于都市、租界日常生活的现代大众文化这一形式所体现。主张“内阁制”的“预备立宪”如火如荼,“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在1905年已经废除,代表传统诗学的同光体也成强弩之末,“诗界革命”吼声正隆,章回小说逐渐为“欧化”小说所取代,思想观念、语言形态、文学体裁一一开始呈现出新的样态。而这又与晚清“西学东渐”这一早期全球化的语境有关。1900年代中国现代大众文化的萌芽,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日渐瓦解,现代文化逐步建立的必然结果。

不难看出,1900年代也是中国现代大众文化诸要素相继萌芽的年代:1902年商务印书馆开始设立印刷所、编译所及发行所,完成了从“印书”向“出书”的历史演进;1903年,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鼻祖周桂笙开始在《新小说》上发表作品,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拍摄于1905年;中国第一部新闻法令《大清印刷物专律》于1906年7月由清政府颁布;早期话剧团体“春柳社”成立于1907年。而且,这一阶段还是中国近代画报业成熟的时代,如北京的《启蒙画报》(1902年)与《开通画报》(1906年)、广州的《时事画报》(1905年)、上海的《东方杂志》(1904年)、《世界日报》(1908年)和《图画日报》(1909年)等等都在这一阶段相继创刊。凡此种种皆表明了,1900年代的十年间,中国现代大众文化的诸要素基本上已经依次出现,称1900年代为中国现代大众文化的萌芽期,实不为过。

综上所述,1900年代的中国大众文化实际上是都市文明、工业文明、全球化社会所催生的必然产物,由大的时代背景所决定,反映了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文化对世界潮流的呼应,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但我们无法忽视的是,这一切也由当时中国的日常生活所决定。正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所言,现代大众文化是“依托传媒业”而生并具备“消费性”的文化形态<sup>[2]</sup>。这两大特征直接决定了,现代大众文化只能存在于现代社会中,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讨论1900年代中国现代大众文化,就无法规避当时的日常生活。从当时日常生活入手来剖析1900年代现代大众文化所呈现出的若干特征,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借此,本文拟从现代科学的传播入手,以日常生活理论为视角,从都市文明的具体特征出发,梳理1900年代中国现代大众文化的若干特征。归纳并回答如下两个问题:一是在1900年代,现代大众文化从哪些地方反映了现代科学的影响?二是在1900年代的中国,日常生活、现代科学与大众文化三者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收稿日期:2015-03-02

作者简介:韩晗,男,河北衡水人,文学博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亚洲学系访问学者。研究方向:现代科技文化思想史。

所谓日常生活,一般是指“个体再生产因素的集合体”〔3〕。因为日常生活使社会的“再生产”成为可能。如果没有个体的再生产,就不会有社会的存在。而且,每个人都具有特殊性和个体性,个人的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会一起发展。从“生产”出发,挖掘二者之间的认同和冲突,构成了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研究方式〔4〕。因此,“日常生活史”也成了近年来史学研究最重要的方法论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所言的“日常生活”,主要局限于研究中国当时都市人群的日常生活,乡村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日常生活并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列。

由大众文化所孕育的1900年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很大程度上由现代科学所决定、助力。作为“西学东渐”的重要组成,现代科学促进了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翻天覆地的变革。经历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学东渐”之后,及至1900年代,现代科学已经渗透至中国大部分日常生活当中,举凡当时中国日常生活所涉及的范畴——衣食住行,无一不与现代科学产生深厚、密切的联系。从现代科学入手,以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是爬梳1900年代中国现代大众文化的一个独特研究范式。

日常生活为现代大众文化提供丰蕴的土壤,促使大众文化勃兴,并依赖于现代科学,渗透到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构成了无数社会个体的生活常态,大众文化便因此而孕育。譬如当时印刷业、运输业的发展导致了晚清报业从冷寂到勃兴的局面。在1850年代,《中外新报》在宁波创办时,“当时风气未开,居民尚无看报的习惯。”〔5〕但在二十年后的1870—1880年代,《申报》竟然促使“江浙一带,尤其是上海,不仅商绅文士养成了看报的习惯,就连粗识文字的店铺伙计,也喜欢看《申报》消遣”〔6〕、“自绅商以至于庶人,靡不购而阅之”(《申报》1874-12-15)。到了1900年代,当时上海、北京、汉口、广州等地少数受过教育的且“凡是留心时局的人,都被养成了看报的习惯了”〔7〕。在这样的语境下,1900年代的“画报热”亦就不难理解。作为一种大众文化,“读报”改变了民众获得信息的方式,而且随着口岸通商的频繁,生活用品增加,广告需求量也加大,以珂罗印、五色石印为代表的印刷技术与照相技术的发展,也让画报的印刷达到“妙肖天然,独运匠心,别出心裁,惟妙惟肖,尽善尽美,凡从前所未睹者”〔8〕,甚至“色分五彩,光艳如生,精妙绝伦”(《申报》1888-05-28)的高度。在这样的前提下,名目繁多的画报自然成了1900年代中国都市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

画报、话剧(又称“文明戏”)与电影,是1900年代中国现代都市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画报的呈现与现代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话剧、电影则更是如此。电影自不必说,下文拟以现代话剧与科学小说为例来谈谈这一问题。

在1900年代,以“春柳社”为代表的留日学生开展了早期话剧演出,上海部分教会学校也逐渐开展“教会学校演剧”,这是中国现代音乐教育、戏剧教育的滥觞。与中国传统戏曲不同,被称之为“文明戏”或“文明新戏”的现代话剧,并非在传统的戏楼里演出,而是在室内。电力技术的发明是舞台灯光乃至世界戏剧史走向历史新纪元的开始,19世纪末20世纪初,舞台灯光在造型方面的意义,远远超越先前的照明作用,成了科学改变文化的重要证明〔9〕。

从这个角度看,出现并发展于1900年代的中国话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科学对于现代大众文化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大众文化来干预当时中国都市人群的日常生活。1907年,春阳社在“兰心大剧院”上演由曾孝谷、李叔同编译的话剧《黑奴吁天录》(今译为《汤姆叔叔的小屋》),结果盛况空前,由于是初创期,演出当然很粗糙,但让当时观众惊叹不已的,则是“舞台一侧还投来令人目眩的灯光”,“变幻离奇”且“良好的灯光”给观众留下至深的印象〔10〕。当年,“新舞台”创办,开始采用灯光布景,其他新式剧院皆效仿之,许多剧院因为话剧演出而票房大增,甚至造成了演员、导演与灯光师等人才的奇缺。在这样的语境下,王钟声在上海开办了第一所话剧学校〔11〕。认为话剧不但可成为都市人生活的重要组成,而且能够成为社会革命的工具〔12〕。

借此不难看出,任何一种都市日常生活新元素的出现,必须依赖于三重因素:一是在“西学东渐”语境下日渐发展并成型的大众文化,二是整个生产商业链的存在,三则是现代科学的发展,三者缺一不可。在一个现代社会里,现代科学为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诞生与发展起到了连接、助力的作用。

现代科学丰富了1900年代的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使得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使得当时的大众文化成了日后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基础,而1900年代的日常生活则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1900年代的大众文化中,异军突起的“科学小说”——即“侦探小说热”与“科幻小说热”实际上就印证了这一点。

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侦探小说”与“科幻小说”并不存在,而是先在西方文学界兴盛,再有中国翻译之热潮,尔后有本土作家的试笔。纵然有近似于“侦探小说”的“公案小说”,实际上所反映的核心并非是如何运用医学、痕迹学、心理学与生理学侦破案件,而是强调“清官”如何推翻冤案,使“淫”“盗”者落网,将“文以载道”“诲淫诲盗”的文学化,至于“科幻小说”则是完完全全的舶来品,在中国本土文化中根本找不到任何一点类似或相关的源头。但是它们很快借助自己独特的题材与

新的传播技术,成了190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反映了当时中国都市日常生活的独特需求。

“科幻小说”能在中国传播,当始于梁启超。1902年,梁启超撰文《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称其与马君武等人在日本联合主编的《新小说》(该刊附设于《新民丛刊》之下)将发表“哲理科学小说”,该刊仍以小说译介为主,如梁启超与罗孝高从日文本转译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Jules Gabriel Verne)的《十五小豪杰》(今译《孤岛历险记》),曾掀起当时国内科幻小说的翻译、创作热潮。

如儒勒·凡尔纳的《海底旅行》(今译《海底两万里》)(卢籍东译,连载于《新小说》第1期至第10期)、《飞访木星》(周桂笙译,《月月小说》第5号)、《世界末日记》(《新小说》第1号至第2号)与《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皆为鲁迅译,前者于1903年由日本东京“进化社”出版,署“中国教育普及社译印”,后者于1906年由南京“启新书局”出版)等舶来科幻小说推动了科幻小说之热,并引发了国内作家科幻小说创作热潮。

在1900年代,与“科幻小说”并驾齐驱的还有“侦探小说”,两者共同构成了“科学小说”这一概念。与“科幻小说”一样,“侦探小说”皆与梁启超有关。早在1890年代,梁启超就曾试译“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并在《时务报》上发表。到了1900年代,凭借着期刊、出版等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侦探小说”的译介成为了中国都市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郭延礼统计,1900年代,“侦探小说”翻译堪称集一时之冠,已经超越了“科幻小说”的热门程度,出版的翻译作品总共达数百部<sup>[13]</sup>。译介之热也带动了创作,唤起了中国作家们的积极性,譬如吴趼人曾表态自己创作侦探小说的目的乃是“塞崇拜外人者之口”<sup>[14]</sup>,因此他写出了《九命奇冤》(1906年)这样的开山之作,周桂笙的《上海侦探案》(《月月小说》第7号,1907年)紧随其后,成为中国侦探小说的早期经典“双璧”。在整个1900年代,“科幻小说”与“侦探小说”完成了从译介到原创的历史性转折,科学小说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各种文学期刊的热销。

尽管学界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与梁启超的思想有相抵之处,但我们亦无法僭越梁启超“小说群治”论与“五四”文化启蒙运动所建立的内在逻辑联系。仅从“科学小说”这个角度来说,梁启超与鲁迅本身就有着先承后续的精神赅续。鲁迅曾对“科学小说”推崇备至,认为有着科普启蒙的作用,这与“五四”时的科学文化启蒙思潮是一致的。“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因此,“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sup>[15]</sup>。但施蛰存对此却有截然不同的评价:“它代表1880至1920年间最通俗、最畅销、而内容良莠不等之大众读物。”<sup>[16]</sup>

这两种不同的评价实际上反映了“科学小说”的历史意义与地位。其一,它的社会性、科普性大于文学价值,它成了当时中国都市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是中下层市民阶层日常生活的读物,反映了1900年代中国社会亟待启蒙的迫切需求,是“科学思潮”伴随着“西学东渐”浪潮与现代都市日常生活的必然性结果,也是对梁启超“小说与群治关系”“新民论”的具体实践,还是“新文化运动”中“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与文化启蒙的先声,如果放眼整个历史来看,当然也可以将其认为是现代中国通俗文学、普罗文学与大众文化的精神根源。“科学小说”不是独立的事物,它具备着历史性、社会性与文化性的特殊解读意义。因此,今日重审“科学小说”的思想史价值,必然无法僭越科学思潮的范畴。

综上所述,画报、话剧与科学小说等现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不约而同地反映了现代科学的影响与意义,现代科学促进了中国社会内在的现代性转型,改变了中国都市日常生活的具体结构与形态,对现代大众文化的产生、丰富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主导作用,如何立足于现代科学的具象化来反思近现代中国日常生活诸要素的建构,进而对现代大众文化的形成进行另一重角度的推敲,则是接下来将要谈到的话题。

## 二

纵观整个1900年代,可以说它是现代科学对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十年,其实也是现代科学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笔者认为,之所以都市日常生活与现代大众文化会配合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并因现代科学而呈现,乃是因为“私人空间”(private spaces)的进一步出现。尤其是对于东方社会而言,“私人空间”是从未有过的新鲜事物,是对于“四世同堂”“胡同里弄”等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存在形态的颠覆与挑战。

因此,本节拟以亨利·列伏斐尔(Henri Lefebvre)与艾格尼丝·赫勒(Agnes Heller)“私人空间”为理论路径,以现代科学对1900年代现代中国的影响为研究对象,进而结合具体的史实与史料,继续深入探讨前一部分所涉及的一个核心问题:在1900年代的中国,日常生活、现代科学与大众文化三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从逻辑关系的角度看,上述问题由两个子问题所组成:日常生活如何通过现代科学孕育大众文化?现代科学与大众文化之间构成了何种联系?

在列伏斐尔看来,“私人空间”是“个人”概念的延续,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存在、发展的基本前提<sup>[17]</sup>。沙龙、包厢、浴室、餐厅、书房等等,都是文艺复兴时代之后“私人空间”的存在形式,是对于资本主义精神、伦理与秩序的一种强化。但这些空间都是物质性的,到了19世纪后半叶,随着电报、电话等通信设备与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的发明,人类在精神上的“私人空间”逐步获得建立。而赫勒则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最大的特征就是“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区分,前者需要“团体”(或曰社群)的力量来捍卫,而后者则依赖于每个人的力量,两者相辅相成。不断明确的“私人空间”实质上为“公共空间”的出现、稳固起到了助力的作用<sup>[18]</sup>。

汽车与电话的发明,是现代科学促成“私人空间”进一步成型的标志,也是形成中国都市日常生活与现代大众文化的重要手段。1902年,北京上海两地第一次引进汽车——前者为袁世凯赠给慈禧太后的祝寿贺礼,后者为旅华匈牙利商人李恩时(Leinz)从香港带入的美国进口车,只供自己使用,工部局为其颁发了临时牌照。在1902年之后,“汽车”这一新生事物在中国开始萌芽、发展,1907年,法国《晨报》还举办了一场“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意在推广汽车文化。及至1910年,上海地区已拥有小轿车154辆(其中包括自用车、租赁车与自由车)<sup>[19]</sup>,而到了1911年则至少有三百余辆<sup>[20]</sup>。可见当时在上海、北京等城市,汽车已经逐渐普及。

汽车的普及实际上暗含了对于“私人空间”的强化,与之同时的则是电话的普及。电话传入中国是在1881年,但因“信用无着”而被工部局饬令停办。及至1900年,南京电报局才开始开办市内电话,1906年,华界在南市码头里街成立中国电话沪局,次年,英国人成立“德律风公司”与之抢生意,到了1910年,该公司在上海安装了1万台电话<sup>[21]</sup>。

电话在通商口岸的普及是1900年的中国都市日常生活一个重要特征。就当时而言,关于电话的宣传并非完全皆与“迅捷”有关,而是对于“私人空间”的肯定。当时在聘用接线员时,要求“除了必要用语外,不许多言,形迹可疑者一律辞退”<sup>[22]</sup>,而且在“英商德律风公司”所安装的1万台电话中,有近4000部是私人电话。

电话、汽车等现代科学产物为中国都市日常生活建构了一套“私人空间”场域,这是1900年代中国社会的特征之一。在笔者看来,从“私人空间”这一角度出发,就上述问题至少可以得出下列两个结论。

首先,在1900年代的中国,现代科学通过交通、通讯所营造出的“私人空间”,促使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因此,现代科学不但改变了都市日常生活,而且为现代大众文化营造出了一个必需的空间。

“空间”是现代西方美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与“时间”相对,是意识形态生产、发展、传播、消费与反馈及其权力分布和变化规律的场域<sup>[23]</sup>。归根结底,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大众文化,都属于意识形态,它们之所以会出现,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现代都市诸基本要素——包括但不限于建筑、街区、公共设施乃至管理制度等等的出现,尔后带动了消费性、商业性社会的勃兴。而“私人空间”的形成,则是现代都市所有基本要素的一个前提。

汽车、电话等新兴科技产物的出现,实际上使得1900年代中国社会呈现出了一个新的阶层,即拥有这两样物件者的“新贵阶层”。他们当中很多人与先前以及当时的帝国贵族、地方士绅或书香世家等传统权贵阶层不同之处在于,并非来自于帝国的体制内部,而是受租界文化所孕育,凭借自己的同乡裙带关系、个人能力与社会机遇,跻身被称之为“买办”(Comprador)或大班等新兴财富阶层,譬如虞洽卿、吴调卿、梁炎卿与郑翼之等人。与盛宣怀、张弼士等“红顶商人”不同,这个新阶层更容易接受西方的新生事物与生活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成了都市日常生活与现代大众文化在近代中国的重要推手。

实际上,这些新贵阶层他们在生活方式上都师法欧西,在意识形态中严格地厘清了“公”与“私”之间的差异。因此,他们对于“私人空间”的维护与看重,远超当时中国其他社会阶层。据统计,1900年代上海地区的私人汽车中,有200余辆为买办、大班等人所购买,而他们当中有近3000人安装了私人电话,驾车访友、电话交流成了这个阶层保持个人交流的重要形式。他们享受戏院包厢、西餐沙龙、电影院、枕流公寓以及汽车、电话等新兴事物带给他们的“私人空间”之快感,构成了一种现代性的愉悦,进而形成了无数个由“私人空间”所构成的社会阶层。

“私人空间”实际上是西方“都市人”日常生活中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资本主义伦理中,“个体”(或曰“个人”)的社会化表达,它构成了都市文明的基本要素。在1900年代的中国,“个体”的意义根本难以彰显,主张“个人”精神的土壤更是绝无,政治上依然奉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皇权意识,在思想文化与生活上照旧将三纲五常奉行为社会基本伦理。因此,新贵阶层的“私人空间”之形成并非自发于民间的传统力量,而是源自于租界文化中的西式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被西方现代科学所催化。

西方现代科学在中国传统的社会土壤上所催化出的“私人空间”,为中国社会分化出新的阶层而助力,并产生了新的日常生活形态。今日我们重新审视这一场外力导致的革新时,不难看出,这个阶层及其附属阶层是近代中国“市民阶层”(或曰

“中产阶级”阶层)的雏形,也是中国现代大众文化重要的生产、消费与建设主体。正是这个阶层,开一时风气之先,促使现代大众文化成型。

一方面,如书局经理、报人与买办、大班等现代大众文化的建设、生产者,他们肯定并认可“私人空间”的存在意义,对于新生事物热情且敏锐,敢于以个人经济实力来扶持新兴大众文化的发展,而且他们及其雇员谙熟于现代科学如灯光、印刷、照相、排版、通讯乃至电影拍摄等等,因此,1900年代的中国大众文化能够得以萌芽,与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扶持显然密不可分。

另一方面,他们还是现代大众文化的消费、传播者。他们之所以能引领、发展大众文化,很大原因在于,他们对现代大众文化有了解,并有消费现代大众文化的习惯,属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有钱、有闲、有消费品位”的阶层。

种种新生的文化事物,几乎无一不是由租界侨民以舶来的形式带入,再影响买办、大班等与租界侨民有密切接触的华人,尔后这些华人再在自己这个阶层中效仿之,形成了“二传”式的“西学东渐”,这是现代大众文化在1900年代传入中国的路径。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在这条路径之下所隐藏着的现代科学力量,显然不可小觑。

其次,“私人空间”的出现还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形态,为观照现代科学语境下的现代大众文化呈现出了一个特殊的视域。

本文所言“现代大众文化”,是一个舶来的概念,特指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之后,在都市社会中所呈现出的文化样态。它在形式上依托于新兴媒体技术而存在,如电影、广播与报纸杂志等等;在内容上,则以当时最流行的“西学”为主,既有建构于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现代大众文化”,反映了都市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又彰显出了现代科学对于市民阶层的影响以及该阶层在社会中所投射的镜像。

笔者认为,“现代大众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发展建立,其很大一个因素乃是依托于现代科学的“私人空间”随着社会现代性的发展而不断建立、强化,进而形成了一个初步具备现代性意识的新阶层。

在1900年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实际上是一个“民间化”的进程,即以最普遍的方式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汽车、电话、火车、医院、自来水、电报等等日常生活要素让当时的中国人最直观地感受到了现代科学的魅力与冲击。但不难看出,上述现代科学的产物是舶来的,它最先被西方社会发明,是符合西方社会生活方式的新生事物。譬如电话、汽车等等有关私人空间建构物件的发明,它既代表着西方现代科学的最高成就,也代表着西方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当它以器物的形式引入中国时,它自身所携带的二重性注定了其不但是西方现代科学的代言人,而且会将西方的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带入中国。

因此,从科学技术的语境来审视现代大众文化,可以发现其“现代性”之处。“科学技术”构成了笼罩在现代大众文化、都市日常生活与私人空间上空的一张网,并推动着三者的共同发展。上述各种现代器物在成为都市日常生活重要组成、私人空间建构以及现代大众文化载体和推手的同时,也构成了连接西方社会意识形态与现代科学之间的桥梁。

当它们在1900年代被陆续引入中国之后,带给中国社会的影响与其说是科学技术的冲击,毋宁说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新的社会阶层与新的都市日常生活相辅相成,共同改变中国近代社会的层次结构与发展路向。

但是,我们必须又要直面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在1900年代的中国,现代科学建构了私人空间,改造了都市日常生活并催生了现代大众文化,但在这个进程当中,西方的科学观念是否也一同引入并助力于中国的文化启蒙运动?

### 三

1900年代,新兴的中国社会阶层实际上扮演了革命者而非改良者的角色。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张静江、虞洽卿、梁炎卿等人都为“中华民国”政权的成立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日益腐朽的中华帝国实际上已经与这个新兴阶层产生了相当遥远的距离,这是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在地性与全球化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使得两者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对立。

可以这样说,1900年代是中国近代社会真正走向开放性的年代,为如何迎接全球化的20世纪定下了一个基调。现代科学及其产物正在以迅猛、积极的劲头来改变中国。但与此同时,它也束缚了真正的科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使得中国人对科学的认识单一化、日常生活化。历史地看,这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晚清“格致之学”“器物之学”这一落后观念的延续,使得西方科学文化的精髓难以真正地传入中国。

众所周知,现代科学在西方的发展,走的是“先理论,后实践”的道路,从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万有引力、黑格尔的逻辑学再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电力工业革命,其间有着漫长的实践过程,而现代科学在西方的出现,又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分不开,文艺复兴打破了中世纪经院神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在精神上使“个人”获得觉醒,而这一切,又为现代科学在西方的发展、实践奠定了相当重要的基础。

但是在1900年代的中国,虽然积极引进了西方的现代科学成果,并用以改造中国社会阶层,但实际上却是“无因之果”。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新兴社会阶层)对于西方科学史、思想史并无了解,认为所谓西方之先进,无非是船坚炮利、电灯电话而已。即使有少数改良派或革命派,对西方的议会、宪政与民族国家理论有所了解,并提出了“皇族立宪”等政治改良措施,但也仅限于望文生义的皮毛孔见。

时至今日,从现代科学语境下出发,重新反思1900年代都市日常生活与现代大众文化诸问题,仍然有如下三点可供反思。

首先就都市日常生活而言,中国在1900年代是现代科学“有表象,无实质”的年代,真正求真、求实、崇尚理性的科学主义精神与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并未在中国获得有效地建立,“私人空间”虽然存在,但却没有建立起理性、公共性的现代社会。

现在学界常用“摩登”“繁华”等字眼来描述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但这只能概括当时中国都市日常生活的表象,物质极大丰富,各种看似具备现代性的器物轮番上场,表面上呈现出了“与世界同步”的假象。当我们将目光投射到1900年代的中国时,发现当时中国的口岸城市只是在器物的层面与世界同步,而真正的现代科学思想及其延伸出的城市伦理、社会公德、公民观念并未建立。因此,这种“摩登”只是器物上的摩登,而“繁华”也只是表面上的繁华。

真正的现代科学思想在当时并未被中国人所发掘。在1900年代的中国人看来,译介自日本的“科学”一词,其实其含义相当模糊。譬如在1901年蔡元培就认为“道家者流,亦近世哲学之类,故名、法诸家,多祖述焉。刘氏谓其出于史官,则如近世进化学家,固取材历史矣。以其与孔氏宗旨小同,故夷之科学,所谓别黑白而定一尊也。”<sup>[24]</sup>在蔡元培看来,科学甚至可以包括道家,而马相伯1902年在修订《震旦大学章程》时,将乐歌、体操等课程都列入“科学范畴”<sup>[25]</sup>,1901年,樊炳清主编“科学丛书”时,竟将历史也纳入到了“科学”体系之中<sup>[26]</sup>。

赫勒认为,“私人空间”的建立实际上意味着“公共空间”同时也随之建立。但实际上这在1900年代的中国又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私人空间”之于1900年代的中国而言,只是一个存在于西方经济全球化殖民的依附体,并非自发性的。从整个社会政治格局来看,中国依然处于封闭当中,“公共空间”根本无法建立。

在这样一个宏大的语境下,实际上隐藏着的是日常生活的悖论。一方面,租界区内应有尽有,高楼建筑并不逊色于当时纽约、伦敦的中心城区;另一方面,华人聚居区却依然缺乏基本的公共卫生常识,垃圾乱扔,随地便溺,污水横流,疫病时常蔓延,以至于租界区西方侨民不得不在许多地方竖起警告,严禁华人进入到某些指定的酒店、商场中<sup>[27]</sup>。这就是后世所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之历史渊薮。如果不从单纯的民族情感出发,仅仅从这个历史现象而言,当时中国新兴阶层尽管生活“洋派”“摩登”,但对于现代科学知识仍然非常缺乏。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设一个真正具备“现代性”意识的社会,不可谓之不难。

其次就现代大众文化而言,1900年代中国的大众文化虽然受到现代科学影响,并与现代都市文明相辅相成,且在现代都市中获得了一大批稳定的读者群,并为日后白话文以及“新文化”思潮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助力。但实际上,它根本无力承担起文化启蒙的历史责任。

以前文所述的“科学小说”为例,梁启超最先的愿望乃是“开民智”,但绝大多数读者并未从中获得启蒙意识,而是成了市井人群消闲的读物。他们通过对侦探、科幻等作品的阅读,来满足自身的审美快感。这与当时“科学小说”推动者的基本意愿几乎大相径庭。

可以这样说,1900年代所呈现出的现代大众文化,在形式上都与“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及“后五四”(即新文化建设期)的文化形式相一致,在表面上具备“现代性”,但究其内涵,却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有着较大的距离。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并没有形成以民主、科学、法治为核心的现代社会伦理,而且这些借助新媒体而呈现的新文化形态本身又处于稚嫩的萌芽期,因此,若从文化本体的角度来考量,1900年代中国的现代大众文化,其“大众性”远远要大于“现代性”。

因此笔者认为,1900年代的现代大众文化,只反映了半个“民主、科学”。所谓“半个民主”,指它为现代文化如何利用大众传媒进行传播而奠定了基础,是对“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的一定程度的呼应,在形式上让新的语言形式与内容广为人知,但它却没有真正地完成传播民主价值的使命;而所谓“半个科学”,是指现代大众文化在表面上利用现代科学传播、发展,并且在题材上对现代科学多有涉猎,但究其本质而言,既缺乏真正的科学思维、科学逻辑与科学理念,也对现代科学的把握有所欠缺,使得现代大众文化与现代科学始终保持着一种似近却远的距离。

这个距离反映了“被压抑的现代性”其“被压抑”的缘故何在。事实上,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自晚清以来的“西学东渐”,是从“器物之学”开始,并没有涉及被称之为“道”的社会伦理、现代文明与价值观念的建立,自然而然“西学”也没有成为改良中国民族根性、民众群体意识与社会土壤的工具,使得一些看似具备现代性意识的器物甚至政治制度(如“预备立宪”等等),一旦“移植”到中国来,就结下了“橘生淮北则为枳”的苦果。

尽管立足当下反观 1900 年代的现代大众文化,发现其与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普罗文学以及海派都市文学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无疑为 20 世纪中国文化定下了总体基调。这是一场仍然存在于帝制阴影之下的文化革新运动,代表了西方现代科学在中国所投射的镜像,它由全球化、战争与舶来文化所推动,主要发端并发展于中国极少数的口岸城市,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先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精神需求,但它仍然不足以承担整个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历史重任,这种“先天不足”的缺陷,也给后世带来了沉重的历史压力。

#### 参考文献

- [1]王德威. 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 宋伟杰,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
- [2]Stuart Hall.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M]. London: Sage,1997.83.
- [3][4]Gardiner. Michael. Critiques of 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2000.90、34.
- [5]范慕韩. 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M].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10.244.
- [6]郑翔贵. 晚清传媒视野中的日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07.
- [7]胡道静. 上海的日报[J]. 上海市通志馆期刊,1934(1).
- [8]宋原放. 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583.
- [9]Paul Kuritz. The Making of Theatre History[M].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College, 1988.94.
- [10]徐半梅. 话剧初创期回忆录[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8-9.
- [11]邱明正. 上海文学通史·上册[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431.
- [12]梅兰芳. 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A]. 梅兰芳文集[C].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 45.
- [13]郭延礼.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46-50.
- [14]吴趸人. 我佛山人文集·第7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 91.
- [15]鲁迅. 新版鲁迅杂文集·集外文·第一卷[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41.
- [16]施蛰存.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二[M].上海:上海书店,1991.34.
- [17]Henri Lefebvre. Rhythmanalysis: Space, Time and Everyday Life[M].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2004. 34.
- [18]Agnes Heller. A Theory of Feelings[M]. Plymouth: Lexington Books, 2009.93.
- [19]龚骏. 中国新工业史发展大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42-45.
- [20]汽车肇祸[N]. 时报,1911-07-09.
- [21]熊月之. 上海通史·第六卷·晚清文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90.
- [22]马长林,黎霞,石磊. 上海公共租界城市管理研究[M]. 上海:中西书局,2011.407.
- [23]Miles Orvell,Jeffrey L. Meikle. Public Space and the Ideology of Place in American Culture[M]. New York: Rodopi, 2009. 64.
- [24]蔡元培. 学堂教科论[A]. 蔡元培. 蔡元培全集·第1卷[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337-338.
- [25]马相伯. 震旦学院章程[A]. 朱维铮. 马相伯集[C].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41.
- [26]罗振玉. 雪堂自述[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13.
- [27]王韬. 瀛壖杂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

## Daily Life, Urban Civiliz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Modern Science: Modern Populace Culture in 1900s

HAN Han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In 1900s, Chinese populace culture such as film, drama, pictorial and science fiction proves the affec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rban daily life makes private space as core, it breeds the populace culture by modern science and changes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society. But because rationality and public society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in China, modern populace culture can't assume the historical duty of culture enlightenment.

**Key Words:** daily life; urban civilization; modern science; populace culture

【责任编辑 康 艳】